

書賈不惜做偽，將許多商業出版物托名於這些名人之下，這種狀況在四堡書商和坊刻本那裡有沒有類似的狀況？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

書中還存在一些可加以改正的史實訛誤，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參考也可以做得更好。如第251頁腳注1稱「李廷機（?-1616）」，「是萬曆十一年（1583）的狀元」，李廷機事實上生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為萬曆十一年會元、榜眼，而非狀元。同頁提及《大方綱鑒》一書，言「相傳這本書是袁黃（1533-1606）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所作，現存殘本的封面上有『新刊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補』字樣」。文獻目錄學家王重民在其代表作中早已指出，此本（掛名袁黃本）為建陽書商余象斗第三刻。第一刻托名李廷機，第二刻又改吉澄校刻本（此本也有在第一刻之前之可能），第三刻又全翻第一刻而改托袁黃。「余象斗自萬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十年之間，三刻是書，三次更換名目，無非欺騙讀者，冀多銷售耳」（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98-99）。

林孝傑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840頁。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積極對外發展大陸政策的同時，更對「滿洲」的各項情勢頗為關注。自19世紀末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日本與滿洲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在此期間，配合軍事擴張和侵略的需求，為數不少日本各領域的學者從事與滿洲歷史、社會性質相關的研究，也留下了許多實證研究成果。然而，戰後日本在復興國內社會、走向國際外交的過程之中，原來曾有過「滿洲經驗」的當事者，卻沒有主動提及自己在滿洲時期形形色色之生活。更確切地說，隨着「戰爭陰影」影響，戰後日本基層社會對討論滿洲可謂是一種禁忌。情況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亦即主要的當事人日益凋零之後，才逐漸有所改變。

1970年代以後，日本的滿洲研究大部份集中於日本殖民地史範圍內，多半檢討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或者表彰「殖民現代化」成果，包括日本民眾對

滿洲開發，以及對滿洲現代化的貢獻。若再進一步回歸到現實層面，則是因應中、日兩國恢復邦交關係，記錄戰後遣返民眾之經歷，乃至他們回國後的困境。然而，這些戰後早期的滿洲史研究，都存在着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研究重點僅限於日本與日本人，將滿洲視為日本帝國殖民史的一部份來探討。不過，近來情況稍有變化，日本學界普遍意識到近代滿洲史不能單純只屬於「帝國史」的一部份，而是必須放在更寬廣的地域歷史之中釐清，並從多元的角度和關係，來恢復中國東北的複雜面貌。例如，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東北史研究，甚至是最近的俄國史、蒙古史、朝鮮史等等，滿洲始終都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可以重新加以定位。由貴志俊彥等人領導編纂的《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以下行文簡稱「《事典》」），就是網羅當今日本關於滿洲史的研究動向、深具代表的最新工具書之一。

誠如該書主編在序文中所陳述，滿洲歷史無疑對於現在及將來的中日關係，不可諱言還是具有重大的指標意義：「現在中、日兩國之間，以負面遺產而提出的各種問題裡，許多事件的根源均來自於滿洲歷史。儘管地域概念的滿洲業已消失，但是滿洲帶來的陰影仍不能視為過去的遺物。成為記憶的滿洲、成為歷史遺產的滿洲，就算是幻影，迄今確實依然還存在着。」

除此之外，觸發本書幾位編輯參與的重要因素，是滿洲本身具有多樣、重疊的性格：包括生態、自然地理、生活環境、民族、文化、社會等方面，再加上相關記錄和記憶的互相交叉，構成日本國內政治及國際政治爭論焦點。然而，「至今很多人的思維之中，依然存在那些固定又呆板的滿洲印象」，所以《事典》可說是站在21世紀來重新回顧20世紀，並以全體概貌來掌握滿洲地區，驗證各項歷史問題。

本《事典》主要區分有「總說」和「事典項目」兩部。總說之目的是為了讓讀者能更容易掌握滿洲的情況，其中又分為：1. 20世紀的「滿洲」(Manchuria)究竟為何？2. 自然環境，3. 民族，4. 政治，5. 經濟，6. 文化，共六項，分別由17位知名學者擔綱執筆。甚至當中幾項，還有更詳細地分類，例如「民族」一項又有土著民族、漢人、朝鮮人、俄羅斯人以及日本人。

至於「事典項目」，則按照時間的次序，共分為三期；總共是由800個條目所構成，並邀請百多名學者負責撰寫。值得留意是，從中也可以看出多位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甚至還網羅了日本整體最新的滿洲史研究成果。像是第1期（19世紀末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收錄有「于沖漢」、「伊藤博文暗殺事件」、「商會」、「糧棧」、「山東幫」、「大豆經濟」等各條，既能反映了中國東北在1930年代以前的制度情況，也能顯示社會風土民

情。第2期的時間則包括滿洲國垮臺前，收錄「苦力」、「自治指導部」、「河豚計劃」、「圖書館」、「水害」等條目，釐清傀儡政權面對的各種境況。第3期針對戰後到20世紀末，其中包括「戰後的東北大學」、「滿鐵會」、「土地改革」、「《白毛女》」等，分別呈現中國和日本在冷戰時期的滿洲課題。這些「事典項目」的內容可說包羅萬象，有人物、歷史事件、企業與團體，還有史料本身內容之解析。饒富趣味地，《事典》甚至收錄了以往研究未被系統討論的「地震」、「溫泉」、「棒球」等條目。不僅如此，該書有意讓在校教師以及一般讀者來利用，也希望曾有滿洲生活經驗的「遺華日僑」，進一步了解該地區在戰後的變化。

一如往常其他的學術著作般，《事典》在最後特別編有附錄、圖版記載、出處、索引等種種信息，方便讀者閱讀利用。筆者認為附錄對於研究滿洲歷史的初學者頗有意義，因為其中包含了年表、各種組織圖、滿洲國策會社一覽、滿洲國政府組織圖、東北地區日本居留民俘虜送還計劃表等多項資料。至少從功能性來說，《事典》等同於一部「指南」，成為我們探索滿洲過去的起點。另外，為了能夠讓讀者更容易理解或想像，《事典》裡還特別收錄了許多相關海報、照片等插圖。

除了提供以上豐富的內容之外，下面就《事典》的特色略舉出三點，並說明其意義。第一點是《事典》內容不僅僅限於一國史實，而是從多國歷史的角度，以滿洲來探討東北亞地區而編輯的。如同前述，近年日本的滿洲史研究課題之一，就是如何擺脫以往的一國之史研究，從更多元的角度、視野來談。所以，事典可說是長年來以此課題為目標的學者之努力成果。例如，書中收錄了「內外蒙古統一運動」、「朝鮮人國策農業移民」、「中蘇友好協會」等，可以看出非唯以滿洲為中心的滿洲史，更是以滿洲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域史。尤其內容包括有俄羅斯、內外蒙古、朝鮮半島等，通通編織在跟滿洲相互密切關聯的地域中。

第二點，《事典》除了具備有詞典、事典等功能外，還有研究工具書之作用。這是因為每個條目皆由各課題、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負責撰寫，並且還在條目內容說明後附上所參考的文獻信息。通過這樣的訊息，讀者可以追蹤到每一條目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課題的專家。雖然每條目極可能受限於作者個人水平與研究影響，但大部份內容堪稱是日本學界的最新成果及認知。

第三點為《事典》條目琳瑯滿目，雖以20世紀為名，但其內容也呈現出19世紀中期以來連續性的關係。此外，1945年日本戰敗後的滿洲史，在以往

研究中經常遭到漠視。然而《事典》刻意收集了大量與戰後相關的內容。更值得大書特書是，書中還收錄過去歷史學並未充份討論的「滿鐵會」、「日本長春會」等。這些條目並非滿洲史本身，而是跟記憶密切相關。如此編輯內容，可以使讀者熟悉長時間轉變裡，關於滿洲歷史的動因及其現況。

結束介紹《事典》之前，還要簡單地指出本書的幾點缺憾。首先，《事典》雖屬於集眾之力完成的工具書，可惜實際上撰寫的外國學者的國別、人數及執筆條目等，相當程度都還是有限。我們儘管看到部份作者盡量納入中文、俄文、韓文的相關研究，但如要真正展現出滿洲地域的「政治性意義」，或許邀請更多中、韓兩國學者來共同參與，那麼爭議也更能突顯出來。甚至以介紹各國目前關切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動態，進而透露不同國家、族群對於滿洲史的了解，都是不錯的辦法。此外，有關國外文獻要如何利用和掌握的介紹，《事典》也並不十分充足。像是保存在臺灣的國史館檔案之中，即有不少關於戰後東北接收課題部份，如發生在1946年1月16日的「張莘夫事件」（張莘夫是一位中國地質學專家，在撫順接收煤礦事業之際，被中共的游擊隊殺死。見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154），便有不少材料。記者于衡便認為該事件雖是接收工作裡的一段插曲，然而卻造成整個東北接收活動上產生性質的轉變。由於事情轟傳全中國，也間接使得許多行政人員不敢貿然逕往軍事尙未收復之地，避免悲劇重演；更耐人尋味地，整件事並激起了民眾的反俄情緒（于衡，《烽火十五年》，臺北：皇冠出版社，1984，頁25-26）。同樣也在遣返課題上，朝鮮和臺灣也有前往滿洲的人士，儘管其數量不及日本國內，但如何將既有研究成果納入到日本的殖民史、滿洲史研究之中，本書顯然還沒有觸及到類似的考量。

第二點是關於滿洲記憶的問題。《事典》條目中雖有「滿洲的記憶（日本人）」、「滿洲的記憶（中國人）」，也列出若干研究討論，惟以站在「帝國」的角度，在滿洲「遺華日僑」的特殊性到底為何？這群人又怎麼去突顯冷戰時期中、日外交議題所扮演的影響，進而展現日本自我的國家認同？（類似有關遣返日僑在戰後所扮演的地位，請見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筆者認為這都值得深思，有繼續深入探索的必要。再者，大量從滿洲遣返歸國的日本人，他們留下各式各樣的回憶資料、口述紀錄、會報，甚至包括照片、明信片等非文字性史料在內，目前也還沒有被普遍重視，迺至充份利用。關於這一點，近年由一批日本年輕學者

所組成的「滿洲記憶」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收集各種有關資料、製作目錄，並對當事人進行口述訪問，試圖從多元的角度來分析滿洲記憶課題。該研究會現以網路期刊的形式，發行研究通訊《滿洲記憶》，提供學者參考（見<http://hermes-ir.lib.hit-u.ac.jp/rs/handle/10086/27095>）。這些有別於官方保存的資料，無疑呈現「滿洲經驗」的另一面向，確實應該挖掘其中意義。

如同本文所述，《事典》代表目前日本對滿洲研究的最新成果。該書的出版，不僅帶給許多研究該領域的學者和專家，以多層次、多角度來理解滿洲，也豐富了一般讀者在回顧與認識滿洲——這個既被日本殖民又充滿爭議的地區——歷史的機會。至少對通曉近代中國東北的社會和文化而言，《事典》絕對是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菅野智博、林志宏

一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白偉權，《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15年，xiv，331頁。

本書作者白偉權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候選人，此書是根據其碩士論文《馬來西亞柔佛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改寫而成，並且運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來研究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新山華人社會。

作者開篇指出，新馬華人社會內部幫群林立，甚至幫群之間為了資源等產生衝突，但是反觀新山華人社會則無此問題。於是作者有此一問：新山華人社會的結構與各幫關係如何？這又是如何形成的？為了回答這問題，作者結合了歷史學着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地理學強調的人與地的關係，並且運用地域社會的概念來解釋新山華人社會的形成與演變。

除了緒論與結論，本書共有三章。第一章探討了新山是如何因應各種人文與地理條件而形成，以及各個時期柔佛的發展與其對新山的影響。第二章則探討了新山華人社會的組成元素與特色，以及各個時期的變化。此外，也討論了新山華人居民的互動與整合。第三章則通過討論新山華人社會的三大公共機構（義山、學校和廟宇），除了顯示這些機構在不同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之外，也同時指出各個時期新山華人內部各個幫群之間的關係與整合。

第一章主要圍繞在自然環境、政治結構和農業經濟三個主題展開。作者